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By KAI-WING CHOW.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xv, 397 pp.**

孔尚任（1648—1718）所著《桃花扇》第二十九齣曾經讓晚明南京書商蔡益所登臺自我介紹：「堂名二酉，萬卷牙籤求售。何物充棟汗車牛，混了書香銅臭。賈儒商秀，怕遇着秦皇大搜。在下金陵三山街書客蔡益所的便是。天下書籍之富，無過俺金陵；這金陵書鋪之多，無過俺三山街；這三山街書客之大，無過俺蔡益所。你看十三經、廿一史、九流三教、諸子百家、腐爛時文、新奇小說，上下充箱盈架，高低列肆連樓。不但興南販北，積古堆今，而且嚴批妙選，精刻善印。俺蔡益所既射了貿易詩書之利，又收了流傳文字之功；憑他進士舉人，見俺作揖拱手，好不體面。今乃乙酉鄉試之年，大布恩綸，開科取士。准了禮部尙書錢謙益（1582—1664）的條陳，要亟正文體，以光新治。俺小店乃坊間首領，只得聘請幾家名手，另選新篇。今日正在裡邊刪改批評，待俺早些貼起封面來：風氣隨名手，文章中試官。」與此類似，蔣士銓（1725—1785）在《臨川夢》第二齣中也讓晚明名士陳繼儒（1558—1639）自道家門：「得董思白（董其昌，1555—1636）極力推尊，更托王太倉（王錫爵，1534—1610）多方延譽。以此費些銀錢飯食，將江浙許多窮老名士養在家中，尋章摘句，別類分門，湊成各樣新書，刻板出賣。嚇得那一班鼠目寸光的時文朋友，拜倒轅門，盲目瞎贊，把我的名頭傳播四方。而此中黃金、白鏹不取自來！」而吳敬梓（1701—1754）《儒林外史》中馬純上的形象更令讀者耳熟能詳，他既是書商蔡益所聘請的「名手」，也是陳繼儒養在家中的「窮老名士」。這些膾炙人口的文學作品所描述的人物形象和歷史場景，反映了晚明商業出版的某些實況。

如同晚明其他許多社會現象那樣，書籍出版的發展和繁榮引人注目。在種類繁多的各類出版物中，傳統的正經正史、詩文集子固不待言，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大量湧現的日用類書、勸善金科、風水寶典、旅游指南、居家必用，以及戲曲小說、科舉用書等等，通過官刻、坊刻、家刻，以及書院、寺廟等大量刊印行世。在書籍的形態上，也呈現出諸多特色：名家編選、鉅公校勘、山人評閱；手書上板、精工雕刻、繡像圖繪、諸色套印。參與編纂、校閱、梓行的署名連篇累牘，書名越來越長，花樣越翻越新，商業用語越來越多，更不用說改頭換面、冒襲偽造之作大量充斥書籍市場。總之，旨在誘使購買者掏口袋的技巧花樣百出。這些紛繁複雜的社會現象，究竟可以敘說

怎樣的歷史變化？透過對這些現象的解讀，研究者究竟能夠捕捉到哪些重要的社會問題？美國伊利諾伊大學（University of Illinois）歷史系及東亞語言與文化系教授周啓榮（Kai-wing Chow）的*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一書，為理解上述社會現象提供了助益。

本書是作者研究中國近代早期（書中指16、17世紀）「士商」文化的部份成果，透過對出版尤其是商業出版在文化和科學中的影響之研究，展現中國近代早期文化上的巨變。全書除序言和結語外，正文共分五章。

儘管迄今為止研究者手頭尚缺乏一張像樣的晚明書商的價格表（如果充份考慮到時、地因素，則尤其如此），但作者在第一章中還是盡量吸收已有的零星研究成果，力圖考察書籍的生產成本和市場價格。在書籍生產成本的討論中，作者考察了各種木材、紙張以及書手的價格，注意到了在商業書籍的生產中，書商盡可能選擇較為低廉的原料和勞動力投入，因此晚明商業出版增長的主要原因是書籍生產成本的持續降低，但這並沒有帶來主要技術的突破。作者還從極為零碎的文獻材料中，鉤稽出盡可能多的不同種類、不同部頭的各種實用書籍的價格，以及這些價格在晚明社會中的相對價值。同時，作者還討論了從政府官員、塾師、士人到書手、建築工、紡織工、水手以及部份女性的收入狀況，以便與書籍的市場價格建立聯繫。作者在結論中認為，相對於其他商品而言，書籍在明代社會中的消費價格並不高；更重要的是，在16、17世紀的中國，不同收入水平的人都具有實用書籍的購買能力。

已有的研究表明，除了「革命」，沒有其他的詞能夠形容嘉靖（1522—1566）以後中國出版業出現的轉折，但這是指出版經濟的繁榮而非技術革命（井上進，〈讀書と藏書〉，《東方學報》，第62卷〔1990〕，頁409-445；大木康，《明末江南における出版文化の研究》〔広島大學文學部紀要，50期，特輯號1，1991〕）。有鑑於此，本書作者在第二章綜合討論晚明的出版技術、貿易和銷售問題時，首先便嘗試回答在明清的出版業中，技術上為何活字未能代替雕版（產生這一問題的前提也與作者關注同時期歐洲活字印刷的發展有關）。作者指出，在商業出版的刺激下事實上兩者均得到發展，但活字未能完全擊敗雕版，原因在於雕版本身具有的經濟優勢——其操作方式的簡單和靈活性使投資者免於承擔大量金屬字模的投資風險。同時作者也強調，在一些比較大的商業出版活動中，活字的吸引力正在逐漸增長。但遺憾的是書中並沒有舉出具體的實例進行分析，而這樣的例子即使在已有的文獻學研究中也並不缺乏。作者還從毛晉汲古閣的出版運作、書籍廣告和裝禎、

稿件來源方式等方面討論商業出版的運行情況，並進而討論這些書籍在主要大城市的貿易情形和銷售場所，認為兩京和江南是主要的消費地，而對於經濟和文化不太發達的許多地方來說，購買書籍仍然是一件困難的事情。由於資料的限制，從書籍貿易到銷售的詳細過程，看來仍然有待於進一步的研究。

在傳統儒家理念中，知識與金錢總是有點水火不相容，但在晚明時期兩者卻前所未有地密切結合起來。本書第三章主要關注寫作、科舉和出版的商品化問題。晚明大量增加的生員數量與有限的科舉配額之間的矛盾，使得越來越多的科舉考試失敗者尋求其他出路，商業出版的繁榮為這一群體提供了不錯的選擇。作者強調，參與商業出版也許是士子除了科舉出仕以外的最好選擇，即使是作為一種謀生手段，寫作、編輯、出版的工作至少也可以視為「業儒」的一部份；對有志於繼續赴考者來說，在獲得經濟收益的同時，也使自己的學習能力得以保持和提高，科舉與出版前所未有地走到一起。當然，致仕的官員、著名的文人同樣是推動商業出版的重要力量。在各種推動力量中，「山人」的出現與盛行具有重要意義。「山人」身份的模糊性使它成為士、商雙方都願意接受的共同身份標籤，這一標籤可以部份地消弭士、商之間原有的身份認同差異，但也要看到它絲毫沒能促使士人產生從政治領域抽身的意圖。本章還重點分析了「派生文本」（paratext）尤其是序跋、後記和評論在晚明書籍出版中的作用。對於出版者來說，名家的序跋既昭示着書籍的可信度，也有利於提高書籍的銷量和身價，而序跋也是捲入出版業的士人的重要收入來源。晚明不同類型的「士商」出版者，如李贄、焦竑、袁宏道、鍾惺、馮夢龍、陳仁錫、徐奮鵬等等，所有這些人在當時形成的巨大吸引力，都曾經成為商業出版中被運用自如的象徵性資本。在這種情況下，包括一個署名、一幅手書題字的移花接木，或部份撤換版面、或整部書地偷樑換柱，各種形式的弄虛作假和盜版翻刻在商業出版中大行其道，目的只有一個——商業利益。針對這種情形，同時也就興起了保護性措施——包括使用特別牌記，出版預售廣告，刊行對盜版的警告語句以及通過政府採取實質性懲罰措施等。作者認為，商業出版既為當時的政治和經濟兩大領域的關係重構提供了一個平臺，為大量以「士商」身份出現的作者和出版者提供了政治追求以外的另一條出路，在文學上也促進了一些新的文學類型和表達技巧的發展和繁榮。

晚明書籍中大量「派生文本」所形成的文化和商業網絡，可以透露許多社會信息。本書第四章主要圍繞商業出版中的「派生文本」檢討文本注釋、

意識形態和政治之間的關係。作者認為，包括「派生文本」、各種選集和注釋本子構成的商業出版，對科舉考試同時也是對官方意識形態形成有效的衝擊，這一過程是伴隨着明代官方教育系統的逐步衰落而慢慢建立起來的。在對晚明四書注釋書的商業化運作的詳細考察中，作者從大量新的注釋本在萬曆（1573—1619）年間的湧現，及其名目繁多的書名、誘人耳目的版式設計、冗長的參考書名單（為出版新的參考書預留了空間）、聲名顯赫的編者群體等進行討論。作者強調，這些作品蘊含的信息並不限於科舉和商業出版，有相當一部份作品還體現了當時的學術思想和社會風尚的新動向。一些四書注釋書有明顯的闡揚王陽明學說的傾向，一些作品還糅雜了禪學思想和民間的善惡觀念，以及體現了逐漸蔓延開來的博學和考據風氣，部份作品還在注釋的名義下對萬曆朝政治提出批評。簡言之，作者認為商業出版一方面與科舉考試形成了密不可分的糾葛，同時也透過「派生文本」為大量士人營造了對抗官方意識形態和批評現實政治的新的空間。

在第五章中，作者試圖從明代文學作品的出版情況檢討文化發展中的問題，指出商業出版為文化生產在經濟領域裡建立了一個新的位置，以此為基礎逐漸樹立起與官方文化標準相抗衡的力量。換言之，商業出版創造了新的實踐，這種實踐逐漸削弱了官方透過科舉考試在文化領域的控制權。作者主張應該充份重視科舉考試和商業出版在各種文學流派史上的作用，並從「前七子」、「後七子」、「八才子」等著名文人領袖與商業出版家的關係，以及其文學作品的出版情況來檢討商業出版對文學風格和形式的重要影響。此外，將科舉成功者的考卷迅速予以出版在16世紀流行成風，它們既作為禮物在親朋好友之間傳遞，更作為搶手貨而受到赴考者的高度青睞。從萬曆年間開始，各種選集的數量突飛猛漲，備考者手頭充棟盈架，其數量已經多到了他們根本無法全部通覽的地步。在這些選集中，同樣大量充斥着「名士」的象徵性資本——他們的序跋手跡和批評解說；並在浙江、江西和南直隸逐漸形成一個與商業出版緊密相連的批評群體。這種風氣的盛行，甚至使得一些批評者進而直接挑別起官方的標準來，公開提倡別樣的文學風格，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公安派的「性靈」主張。對晚明科舉考試和商業出版影響甚大的還有當時大量湧現的詩文社、讀書社，參與社盟者既是商業出版的重要稿件來源，同時也是這些出版物的主要消費者。作者指出，沒有晚明科舉應試者的結盟風氣和商業出版的盛行，像復社那樣的組織是不可能出現的，而正是這些組織及其參與者，他們的實際活動長時期地跨越在經濟和政治兩大領域，在士與商之間左右搖擺。

近年來，有關明清時期出版文化史的研究，在國外受到相當的重視，已經產生了一批可觀的研究成果。在日本方面，如大木康《明末江南における出版文化の研究》（1991；修訂本題為《明末江南の出版文化》〔東京：研文出版，2004〕）、磯部彰《〈西遊記〉受容史の研究》（東京：多賀出版，1995）、井上進《中國出版文化史：書物世界と知の風景》（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2）；在英語世界，《Late Imperial China》雜誌推出“Publishing and the Print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中華帝國晚期的出版與印刷文化）專號（1996），Lucille Chia出版*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Fujian (11th-17th Centuries)*（牟利之印刷：11—17世紀福建建陽的出版商）（Cambridge, MA: publish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for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以及周啓榮和包筠雅（Cynthia J. Brokaw）合編的*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中華帝國晚期的印刷與書籍文化）（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等。在這一研究熱潮中，本書仍然是值得重視的一部。

整體而言，本書的貢獻是多方面的。對中晚明以降「士」、「商」關係的變化，學界已有不少研究，但本書的獨特取徑就在於從晚明商業出版的繁榮，檢討當時「士」、「商」關係的互動和「士商」的形成。這確實不失為別具一格的視角：對於大量需要尋求出路的士人來說，無論是賣文為生、還是棄儒就賈，相對而言，參與商業出版的某些環節都具有不可忽視的吸引力。商業出版具有更大的詮釋空間，它在士與商之間搭起了一座雙方都比較容易接受的橋樑，尤其對於士人來說，他們可以在看似不離本業的情況下，悄悄地插足於經濟領域的活動，當然表面上他們更願意忘記這些活動的經濟意義（頁101）。對商人來說，名公巨卿的序跋手跡既是促進銷量的有形之物，文人名士的象徵性資本同樣值得珍惜和擁有。當然，作者在書中討論的不少亦士亦商者的身份變動與搖擺，更為理解士、商關係提供了具體入微的例證。但問題仍然是存在的，至為棘手的是仍然極度缺乏有關書商的資料，即便是像余象斗（約1560—約1637）這樣的典型書商，也沒有像樣的傳記文獻保存下來。因此，對於討論士商互動關係而言，還有待發掘更多的文獻，尤其是商人角度的材料。從書籍史的角度來看，我們並不缺乏諸如明代出版機構、管理、出版中心地以及書籍的裝幀設計、印製技術等從出版史、文獻學角度展開的研究。而本書值得注意之處還在於，在1950年代末年鑒學派創始人之一的費夫賀（Lucien Febvre）開啓書籍的社會史研究近半個世紀後，

周啓榮成功地將這一研究進路運用到晚明商業出版的綜合研究中，將晚明的商業出版繁榮置入商品化的社會浪潮中，考察其生產、貿易和銷售、閱讀群體、社會效應等，並進而檢討其與晚明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科舉、社會風氣的互動關係。

相對於晚明商業出版的紛繁複雜情況而言，為數甚多的現存明版書籍仍然有相當大可資開掘的研究空間。在討論書籍的生產成本時，作者幾乎沒有利用晚明出版的大量與宗教有關書籍，這類書籍的出版並不必然與商業絕緣，而它們往往能夠提供更為準確和直接的信息，例如萬曆末年由錢謙益等輯校的《宋文憲公護法錄》，幾乎每卷末尾都提供了善信捐助者名單和詳細的刊刻字數與費用的數目。事實上，《徑山藏》中擁有這方面的豐富素材。此外，就現代研究成果的綜合和吸收而言，本書也還有努力的餘地，如繆咏禾的《明代出版史稿》（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對於本書第一、二章的討論至關重要，而佐野公治的《四書學史の研究》（東京：創文社，1988），更應該成為作者在第四章大量討論商業出版與科舉用書，尤其是涉及到晚明四書注釋問題時不可或缺的參考。

劉勇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吉原和男、鈴木正崇編，《拡大する中國世界と文化創造——アジア太平洋の底流》，東京：弘文堂，2002，vi，496，x頁。

目前人類學的研究領域中，所謂全球化取向之下的文化流動之研究已成為其主要研究對象之一。其部份原因與該學科的研究對象之轉變有關，也就是說這幾十年的人口流動與其所產生的文化動態，使得人類學者反省過去人類學以封閉的小區域為其研究對象之前提，且逐漸注意到人口跨境流動在速度上的加快和數量上的增加，及這種流動產生的各種文化上的變化。至於以中國為中心的領域，自1960年代起，由香港、中國等地遷徙至世界各地的所謂「新移民」紛紛出現，此現象可以認為是全球化過程的先驅，亦是《擴大的中國世界與文化創造——亞洲太平洋的底流》一書研究之出發點。

基於此種研究對象的變遷，此書試圖實現華人華僑研究上的兩個範式（paradigm）之轉換。第一個範式轉換為由「移民研究」至「移動研究」之轉換。過去，「移民」概念被「國民國家」框架束縛，因此「移民」研究的